

from Erik Ringmar, *A Blogger's Manifesto: Free Speech and Censorship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ondon: Anthem, 2007)

第三章 倫敦政經學院的言論自由與言論箝制

經過第一個月寫作的興奮期之後，我開始期待平靜的生活。那些關於同事畫老二的糗事以及鑄造中東彎刀的狂人都已經用部落格軟體紀錄起來，整齊地堆放在一個個超連結裡，只有真正好奇的人才會發現這些東西。我開始尋找新的寫作題材，這一點都不難，因為學術圈就是靠發表高論（pontificating）維生。只要把今天的頭條新聞給我們，我們馬上就可以進行即興演說。這就像是一場假的「只要一分鐘」（Just a Minute）¹，但學術圈通常會偏離主題很遠，而且不斷地重複。

然而，我決定不寫新聞評論，而是要用自己部落格來批判。演說與寫作需要一個正式的身份，你必須假扮成權威、專家，或者是擁有獨特與寶貴想法的人。這就像在演戲，但事實上大部分的時間裡大多數的學術工作者和普通人（average Joe）一樣無知且缺乏自信。你無法在演說或書中承認這件事，但你可以在部落格裡這麼做。我的部落格成為我私人的告解室，對坐在前排的人小聲吐露心聲「我早上應該好好準備這場演講」、「我無法再忍受改考卷這檔事」、「你們知道嗎？我從來沒讀過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我只是假裝看過」。

這樣告解絕對是無罪的。但是在英語學術圈的脈絡裡，這些肺腑之言卻出人意外地具有顛覆性的效果。就像君主國家或教會一樣，學術圈高度依賴所謂的神秘性以及艱澀的術語來合理化自己在社會裡的地位。神秘性與艱澀術語保護大學不受外人檢查，並把敬畏感灌輸給社會大眾，而批判想法與無知告解往往會破壞這種神秘性。

這也是我不斷寫部落格的原因。我在虛偽的學術圈裡向來都不是一個大人物，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學者把自己看得特別重要。因此，我決定要用自己的部落格來寫點東西，打開一扇窗讓訊息流出去，並且大力踹幾個混蛋。我決定將批判的本領發揮在自己身上與我工作的地方，那就是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²

¹ 譯按：「只要一分鐘」（Just a Minute）是一個 BBC 製作的廣播節目，從 1967 年 12 月 22 日開始由 Nicholas Parsons 主持，可稱得上是 BBC 電台最長壽的廣播節目。在 2003 年獲得 Gold Sony Radio Academy Award 獎項。節目遊戲規則是讓參加者針對既定的主題發表「一分鐘」的意見，不能重複、猶豫或者偏離主題。

² 譯按：成立於 1895 年的倫敦政經學院是由四位「費邊社」（Fabian Society）成員——Sidney Webb 與 Beatrice Webb 夫婦、Graham Wallas 和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 1894 年所提出的構想，後來得慈善家 Henry Hunt Hutchinson 等人捐款贊助。該校創立主要是希望透過社會科學研究貧窮與財富不平等相關議題，然後提出一套「改革」社會的理念，這套理念影響了後來英國工黨的發展。學校創辦的目標是希望將高等教育帶給工人階級，因此剛開始都利用夜間上課。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倫敦政經學院已經成為英國與世界知名的學府之一，校訓為「瞭解萬物發生的緣故」（*Rerum cognoscere causas*）。

舉例而言，為什麼從來都沒有人告訴我們學校賺了多少錢？想也知道，因為保持神秘對校方有利。校方讓每個員工都覺得自己賺得比其他人多，但事實上員工的薪水少得可憐。人是會相互比較的，為了替階級鬥爭做出適度貢獻，我把賺來的每一分薪水公布在網路上。果然，學生被教授的低薪嚇到。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也在網路上指出這一點），英國教授一年的工作時間一般不超過五個月，剩下來七個月時間拿來「做研究」，那就是只花一點時間進行閱讀、花一點點時間進行訪問，並且花很多時間在「罵人」（buggering off）。你沒看錯！罵人也成為另一篇部落格文章的標題。

接下來提到學生繳的學費。倫敦政經學院極度仰賴——甚至可以說是上癮——學生的學費。假如政府無法養活學校，那麼學生就必須要扛起這個責任。從我開始在倫敦政經學院教書十年來，學費不斷飆漲，尤其是博士生的學費更是不合理。他們心不甘、情不願地從口袋中掏出一萬兩千英鎊，卻只是換來和一個心不在焉的指導教授幾次當面討教的機會。許多博士生因為無法負擔倫敦昂貴的生活費，只能離開倫敦返鄉，焦急地待在孟加拉（Bangladesh）、波札那（Botswana）或波利維亞（Bolivia）想辦法完成論文。他們把全家一整年的收入奉獻給倫敦政經學院與英國的經濟收益。我們可以這麼說：「真是一群凱子啊！」。這就像是落後國家對先進國家的外交援助，或者說他們真的、真的很愚蠢。總之這就是我在部落格裡談的事情「孩子！不論你做什麼都好，就是不要讀博士！要不然就去美國唸，那裡有豐厚的獎學金也有符合博士程度的課程。」

看看學校每年收多少錢，我們至少可以期待大學提供未來的學生足夠的資訊吧？假如教育跟擺香腸攤一樣，大學有義務把他們用哪一種肉、添加哪些香料、以及脂肪是多少告訴學生。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過去幾年的教學評鑑結果公布在網路上，提供學生參考。但是學校當局有一千個不能公布評鑑的理由，事實上他們只是擔心真相被揭發。公布評鑑差的老師會使他們丟臉，也會使爛大學遭到唾棄。我決定不等學校的正式同意，我要在部落格上公布自己的教學評鑑，讓學生評鑑放在屬於它們的地方——也就是學生隨手都可以拿到的地方。

我還提到政府系的老師族群組合非常奇怪。我們系有四十九個專任老師（包含討論課講師與約聘講師）。十六個教授裡只有兩個不是英國人，相反地剩下三十三個還沒升上教授的人裡頭，有二十五個都不是英國人，只有八個英國人。換句話說，非英國人可以受聘，但因為某些原因英國人把教授這個頭銜留給自己人。這似乎就是英國機構的通則，政府系就和其他地方一樣，都是靠著進口、剝削外國勞工來替他們做低階的工作。因此，我得出一個結論：「教授們組成一個俱樂部」。

這個俱樂部和所有俱樂部一樣，主要是由社會心理因素所主導，而非透過知識原則來管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確定俱樂部裡頭沒有人會搗蛋。這點當然很難保證，因為所有的教授都會勾心鬥角。所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選進來的人必須跟

原有的俱樂部成員一樣。挑選「牛橋」的畢業生可以保證系上平平安安。畢竟，牛津與劍橋的學生一定會這一招：當大家在私底下拿刀互捅時，還是會很有紳士風範地相互點頭。

招生日的演說

你可以對你工作的地方說三道四嗎？你可以把這些狗屁倒灶的事拿到公開場合來講嗎？當時我真的覺得可以這樣做，而且我也真的這樣做了！要不然言論自由代表什麼？我清楚知道公開批評自己服務的單位並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但我認為大學不一樣。大學不就應該充滿「批判想法」嗎？倫敦政經學院不也是這樣的地方嗎？當時我有點天真，我每一封電子郵件後的簽名檔都會加上我的部落格連結，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部落格每一天大概有幾十個人造訪。

但是，當時並沒有太多人看過我在網路上寫的東西，直到我踩到這坨「狗屎」之後，才有大批支持者湧入我的部落格。這真的是一坨狗屎，但也真的有一批支持者。2006年3月22日，我在招生說明會的第一天做了場演講，對象是倫敦政經學院未來的學生與他們的家長。我當然不是這場演說的最佳人選，雖然我已經在倫敦政經學院教了十年書，也教過各種不同的大學部課程，但我從未動腦想過究竟這所學校的大學學位代表些什麼？當天早上演講前我有點忐忑不安，我試圖推辭這項工作，但是系主任 George Philip 教授告訴我只要按照手頭那份系上所提供的資料唸就可以了。Philip 說我代表政府系的「門面」（face）與「學術表現的保證」（reassuring academic presence），這份差事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會使用 PowerPoint 的人而已」。

聽起來不大妙。這件事明顯要由一個善於推銷的人來做。他必須按照系上提供的資料講述學校與政府系的歷史，並說服這批學生從眾多競爭的學校中選擇倫敦政經學院。如此一來，每個學生第一年就必須為自己的教育付出白花花的銀子，每一個人頭可以替學校帶來三千英鎊的收入，以彌補國家對高等教育補助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被迫要暫時放下知識份子的尊嚴然後把錢收下。「打開 PowerPoint，開始推銷產品吧！」

問題在於我並不是很會用 PowerPoint，而且我除了自己之外也不是任何東西的「門面」，另外我也未曾把提供所謂的「學術表現的保證」做為目標。最重要的一點：我不是一個推銷員。我不贊同把高等教育商業化，更討厭學術必須要花言巧語到處推銷。這些觀點都寫在我的部落格裡頭，但 George Philip 顯然不是我的忠實讀者。

既然無法擺脫這個任務，我決定要上場演說，但要按照我的方法來講。我所知道的最唯一方式就是盡可能的把在倫敦政經學院這種菁英大學裡讀書是怎麼一回事，一五一十的告訴聽眾，重點不在於痛批學校而是把過去幾年我從學生那邊聽到的實際經驗告訴未來的學生。我從未懷疑過倫敦政經學院是一所很棒的學府，因此當然也應該把「真

相」當成招生的工具。

我的確提到倫敦政經學院大部分的老師都把上大學部的課排在工作清單的後頭，只有教書也無法讓講師升等。「假如你想要一個璀璨的學術生涯，你就必須出版。」

這就是說一流老師的心思通常放在其他地方，對大學部的課就沒那麼用心。他們常常到外地參加研討會，即使他們人在校園也有可能心不在焉。

更糟的是，我認為學生在倫敦政經學院的課堂經驗與在名氣較小的學校並沒有明顯的差異。但是，學生選擇會這裡的原因並不難理解：

不管讀哪一所大學，每間學校大學部的課程基本上都大同小異，開出一樣的閱讀清單、使用同一本教科書、出類似的考試題目……講師之間也沒有什麼不同。許多時候大家搶破頭要進入同一所學校的原因，與其說是看上倫敦政經學院，不如說是選擇倫敦這個大都會。

倫敦政經學院真正獨特之處在於它的「學生」。我指出「我們能夠招到地球上最聰明、充滿好奇心、睿智、有錢、與最有魅力的學生。」這才是你為什麼要選擇這所學校的真正理由。

成為倫敦政經學院的學生，你就變成這群才華洋溢、來自各個不同文化既聰明風趣又有野心的人之中的一份子。這些人是你的朋友與同學，你會從這群人之中找到男女朋友。他們和你一樣！在往後的人生歲月裡，你將是遍佈全球的倫敦政經學院校友網路的一部份。

倫敦政經學院的反應

當天下午回家以後，我把整個演講的內容放到網路上，並在部落格寫出對這件事的感想。我並不期待有人對此發表意見，事實上什麼也沒發生。幾天後，我收到一封 Geroge Philip 寄來的電子郵件。事情的演變超乎我的想像，學校招生部門的行政人員出席了這場演講，她在她的主管面前痛罵我，這位主管馬上通知我老闆。學校隨即對此事展開調查，並找來當天在場的人作證。Geroge Philip 認為我的演講內容「偏離了事先準備的內容」，「污辱了同事並且不鼓勵未來的大學生申請本校」他因為這場招生日的演說把我痛罵了一頓，並牽連到我寫的部落格。

這個部落格「所寫的東西嚴重傷害到你自己的名譽……而且很有可能傷害到學校的聲望。」Philip 希望從現在開始一次「非正式的口頭警告」就夠了，附帶著我必須同意先「摧毀並刪除整個部落格，並且在進一步的通知前關閉所有的內容」。其次，「未來再有類似的機會代表整個學校時要好好做，不要再想做這種損害學校名譽的事。」Philip 也給我一長串名單，要求我向這些人道歉，包括那名負責大學部招生的職員。

在這個情況下我能怎麼做？我寫電子郵件給系上的同事尋求支持，我對學校的職員監控我的言論、扭曲我的演講、以及學校要求我閉嘴這些事感到很生氣。沒有人可以指使我在課堂上講些什麼，不論他是部長、系主任或者是撒旦。當然，我並不期待系上同事會同意我所寫的每一件事，但我的確相信他們至少會講幾句「伏爾泰式」的話來討論言論自由的權利。系裡的大教授們迅速且公開地回應我的信，他們完全同意系主任處理此事的方式。這件事再清楚也不過，他們一致認為我做得太超過了，而且根本沒有寫部落格權利這回事。「我們受夠這些青少年引人注目的花招」，這些「愚蠢的通則」與「部落格裡的狂妄自大的想法」。他們認為我需要「貼近現實」，假如我的觀點被主流媒體報導出來，就會

嚴重傷害到系上大學教學的名聲，如果演講上的說法傳開來就會不利於學校的招生，也因此會破壞在這個團體（joint enterprise）裡同事們的生存機會。

這不是關於寫部落格這麼簡單，這關乎刻意傷害本系的名譽以及系上善良的同事。

我完全不同意你說教授只關心自己研究這件事，但我目前在外地參加研討會，無暇詳細評論此事。

還有人指責我就算是系上真的有做這些骯髒的事，你為什麼要在公開的場合把它捅出來？「趁你在沈思自由的意義時，我建議你馬上把所有關於倫敦政經學院人、事、物的文章從部落格撤掉」在許多學校與公司裡，像你這樣污衊老闆與同事的員工很可能會被開除。想想你自己有多幸運吧！」

事實上同事們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有些反對的聲音開始出現。有幾個比較年輕、有勇氣的老師站出來捍衛我說話的權利，雖然他們很謹慎的指出他們不完全同意我所說的每件事。更多的支持聲音是透過私人的電子郵件，但是大多數的同事都選擇沈默。他們為何要在這件充滿爭議的事情上表態？為何要冒險和那些掌握升等權力的大頭們作對呢？

為了釐清適用在部落客上的規定（rules），我開始聯絡倫敦政經學院的校長 Howard Davies 爵士。電子郵件寄出之後幾天都沒有回音，但最後總算收到他的回信，信裡面這樣說：

我完全同意你們系主任的觀點。我看了你的部落格，在我看來這些文章傷害到學校，也批評到你的同事和學校教師升等的程序，這些都是不恰當的。我必須反駁你對學校刻意歧視非英國籍教師的指控，據我所知你說教師升等的決定完全忽視教學也不符合事實。

在我看來，你後來寫給同事和我的信其實有點狡辯。這個問題無關學校對部落格的態度，而是一個員工能否不顧後果地公開詆毀自己的老闆與同事。我也知道你把這些違背真相的話說給參加招生說明會的學生與家長聽。我認為你應該好好反省這些令我失望的行為。

這封信嚇到了我並讓我感到擔心。我的恐懼完全有道理，但是卻找不到吃驚的理由。Howard Davies 是商人不是學者。他擔任倫敦政經學院的校長之前是「英國金融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與「英國工業總會」的主席（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他對事情的反應就像是老闆的本能，而不像學者的態度。他下命令給下屬，並期待他們遵守命令。就跟其他英國人集團一樣，他很清楚規定但卻對原則（principles）一無所知。

讓我再說清楚一些，其實倫敦政經學院並不反對言論自由。一點也不！比方說，2006 年秋天，本校的教授登上頭條新聞，因為他們預測人類未來會演化成兩種獨特的人種，一種是具有高大基因的菁英，另一種是不識字的侏儒、額頭很低、智商更低。同時，另一個教授指出非洲的貧窮問題是因為黑人智商比較差所造成的結果。在這兩起事件中，倫敦政經學院都很快站出來指出教授有權發表這些讓人聽起來不爽的言論。

我犯的錯就是將這個言論自由的權利用來討論這個組織，那就是倫敦政經學院與英國學術界。每個人（包含 Howard Davies 爵士）都會同意言論自由很好，只要自由的演說不打消學生申請倫敦政經學院的念頭就好。在這個教育商品化的時代裡，言論自由的限制是由市場所決定。

George Philip 與 Howard Davies 都沒有收回他們對我的恐嚇，我依然受到監控。學校裡有一部電腦點閱我的部落格超過一千一百五十次，還有好幾部電腦點閱好幾百次。這當然有可能是我的「忠實讀者」幹的，但我還是有點懷疑。這不是言論自由，只要擔心恐懼，你就無法自由自在的思考與寫作。

最後我受夠了。我不是一個鬥士，也不喜歡和當權者衝突，更不習慣挑戰英國集團。雖然很不願意，我還是忍痛把部落格關閉。

學生救了我

但是幾天之後，受到學生對此事的反應所鼓舞，我決定公然反抗系裡的禁令與校長的威脅重新把部落格開放。學生往往天真浪漫也非常具有理想性格。只要給他們一個反抗的理由，學生就會奮不顧身地跳進來。他們完全相信大學是批判思想的集散地這種謊言。

有一天凌晨，我把部落格的連結寄給大學部的學生。畢竟他們才是我們在討論學生經驗時最有資格說話的人，我想知道他們是否同意我對學校的看法。大約一個小時過後，我收到第一個學生的回應，她說她剛剛才從城裡的派對回到家。她幾乎是用喊的：「哇哇，老師！終於有人把事實的真相說出來了，總算有個老師有膽把倫敦政經學院學生內心的想法講給大家聽。偶像，我真的很崇拜你。」好吧，我想她可能喝醉了，但還有幾個人陸續回應我：

我真的很喜歡你的招生演說。我認為你打對地方了。假如學校對演講內容有什麼意見，我只能說問題出在你講得實在「太」坦白了。

我要替每一位我所遇到打從心底支持演講內容的人講幾句話...祝您好運，學生會一直在站您這一邊。

我剛剛讀了你的演說內容，我真的認為這是我讀過對政府系生活最精準的敘述之一。大部分內容也都是學生與老師所公認的事實，假如有人說內容不符合事實，那他可能是站在拍學校馬屁的一邊。

還有幾個學生堅持真實描述學校的情況遠比那些花言巧語更有可能吸引到學生。「我們並不傻，你知道嗎？」

但也有少數學生並不支持我，他們認為我糟蹋了一所他們犧牲一切來讀的學校。另一方面，遠在奈及利亞與墨西哥等地尚未決定要唸哪一所學校的學生則告訴我這場演講的內容提高他們選擇倫敦政經學院的意願。

有一個非常熱情積極的學生在 *Facebook* 上發起一場「我支持林瑞谷」（In Support of Erik Ringmar）的活動，簽名人數很快超過 380 人。倫敦政經學院學生報紙《河狸》（*The Beaver*）報導這件事情時提到「大批學生支持被校方威脅的講師」，並且刊載了一篇言之有物的社論探討學術界言論自由的權利。(45) 學生向我轉述他們在校園裡聽到關於「政府系那個講師」的對話。不久之後，我就聽到一個課堂助教把我捧上天：「學生的英雄，倫敦政經學院的傳奇人物」。嗯，我會把這些評價刻在我的墓碑上！

倫敦的《衛報》與《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al Supplement*）報導了這件事，標題是〈倫敦政經學院裡寫得太超過的部落格〉（*A Blog Too Far at the LSE*）與〈講師的部落格照亮言論自由〉（*Lecturer's Blog Sparks Free Speech Row*）。倫敦政經學院的發言人極力把傷害降到最低。她說這個部落格充滿著「挑釁與可能毀謗的言論」，她也很大方地說學校認為「這件事已經告一段落！」但是在《衛報》那篇報導裡卻大量引述我部落格的文章。我腦袋裡忽然想到一件事，我太太常常說我是一個「可愛的怪人」，而在可愛的怪人與官僚公開的對決中，獲勝的往往是可愛的怪人。

《衛報》那篇文章的後頭附有我部落格連結，使得造訪網站的人數暴增。單單是2006年5月4日當天，我的部落格就有五千個訪客。對一個學者來說，假如你寫的學術文章有五百個人看就算是「很多」了，但當時我一天就達到這個數量的十倍。更酷的是這個連結讓我可以直接和《衛報》的讀者對話。我在部落格裡表達我對這篇報導的想法，透過連結讀者馬上知道我的回應，而可憐的倫敦政經學院官僚們則完全在狀況外，《衛報》無法放上他們的網址，因為他們沒有部落格。

部落格圈開始關注此事。我的部落格在 *Technorati* 的排名攀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點入我的網站。大部分人對此都感到吃驚。「對倫敦政經學院的發生的事感到好奇」，倫敦發生一件奇怪的事，法國人說：「我們在倫敦政經學院的朋友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一個中國網站對於我鼓勵學生到美國唸研究所的說法很感興趣，而馬來西亞的網站則開始懷疑英國學術圈是否已經失去自信心，至於美國人則是嘲笑、再嘲笑、不斷嘲笑。他們說「那些整天只會喝茶、神經不敏感的英國人會爭取自由？我還以為只有美國人會這樣做。」（46）

虛偽的專家

假如我在沃爾瑪（Wal-Mart）或麥當勞工作，那我的老闆如此反應就完全可以令人理解。沃爾瑪與麥當勞的工作並不是在鼓吹言論自由，然而那卻是倫敦政經學院的職責。倫敦政經學院往往讓世人覺得它是公民自由這件事的權威。

這項光榮的傳統可以追溯至倫敦政經學院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這本書中，強力支持開放性與批判思想。波普認為歷史並不存在既定的軌跡，只有當我們能夠自由發問時社會才可以進步。在冷戰的時候，波普的觀點也許是西方知識火藥庫中威力最大的武器。

波普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學生索羅斯（Georg Soros）再度運用波普的觀點創立「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在蘇聯瓦解後，索羅斯經由慈善事業支持獨立報紙、網站與市民社會組織。倫敦政經學院當然很喜歡索羅斯，他也常常造訪本校。校方想要從他口袋裡拿到錢，我想他也希望通過校友身份得到學術界的認同。

所以倫敦政經學院到處都是市民權（civil rights）的專家，學校有「市民社會中心」（Center for Civil Society）、「人權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全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在法律與媒體系（Law and Media Department）還有一批新媒體與言論自由的專家。我自己的系裡也有一群政治哲學的權威，他們的工作就是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生講授西方自由權的傳統。還有一個叫 Andrew Puddhephat 的人，他成立了一個名為「第十九條」（Article 19）的國際人權組織，鼓吹人民自由表達的權利。只要你夠幸運可以見到 Howard Davies 爵

士本人，你或許也會發現他也大力鼓吹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就跟任何人預期的一樣，倫敦政經學院校方妥善保護言論自由，校方的「言論自由實行條例」(Code of Practice on Free Speech) 很詳細地把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納進來：

此項權利應包含不論國界可以尋求、接受和傳播消息與思想的自由，不論是通過言語、書寫或印刷，以及透過藝術或他（她）所選擇的任何媒介。

我雖然不是一個律師，但我當然知道「他（她）所選擇的任何媒介」應該包含部落格。事實上，倫敦政經學院更進一步對那些冒犯言論自由的人制訂出一套嚴厲的規定。

學校的成員或其他人違反「言論自由實行條例」的行為將被視為是嚴重觸犯校規，根據個案的情況，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在相關的懲處規定下的對象。

在我看來，Howard Davies 與 George Philip 很明顯都違反了學校的規定。2006 年夏天，我正式向倫敦政經學院的「言論自由小組」(Free Speech Group) 提出書面申訴。其中一名小組的成員回信說他正在度假，自此之後我沒再從小組那邊得到任何通知。2006 年聖誕前夕我再度提出申訴，而且把副本給 Howard Davies 與學生報。Howard Davies 的秘書回覆我，但言論自由小組則是毫無消息。就這件事情而言，倫敦政經學院這一個「言論自由」小組是死都不願意開口。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所高等教育的名牌大學為何如此偽善？這個問題困擾了我一年，我想我最終找到了答案。

問題在於倫敦政經學院是專業知識的中心。所謂的專家是指具有特定技能與學問專研很深的人。專家所提供的解答來自於他們所擁抱的理論，這些專業知識賦予倫敦政經學院獨特的地位，也使得學校人員自命不凡。他們想要我們相信倫敦政經學院是政府的智庫，而教授應該提供政策建議來改變世界。

但是事情並不是如他們所想的那樣。由專家所主導的社會工程在歷史上的紀錄都很糟糕，看看經濟發展的問題與第三世界經濟援助的後果。通常專家對於事情的影響有限，很多時候甚至會讓事情變的更糟糕。原因在於只有理論知識是不夠的，另外還需要在地與實用的知識，以及當地情況的資訊。這種知識不是理論性，甚至不可能透過文字呈現。所有的在地人都清楚這些情況，並且私底下在背後嘲笑專家。一旦專家飛回學院裡，他們就忙著收拾專家留下的殘局。

倫敦政經學院跟其他學校一樣，也都有許多在地知識。你無法用抽象的計畫管理這所學校。你不需要理論，而是需要正確理解這裡的人、事、物。基本上，這就是學校裡每

個人（包含 Howard Davies）想要告訴我的道理。也是他們不斷反覆告誡我的一件事：「回到現實中來吧！」抽象的原則很好，但不要過度堅持。最後還是要有人來資助我們下一個研究計畫。

這就是為什麼倫敦政經學院專家眼裡所看到的言論自由都是別人的事。他們關心貧窮、遙遠或者是後共產主義國家的事，跟此時此刻生活在此的我們一點都不相干。這也是為什麼言論自由是一個重大且重要的議題，而不是一件世俗與瑣碎的事。我們的專業知識是拿來用在其他人身上，而適合我們自己的是實用的知識。我們把這些崇高的原則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並依靠實際經驗來處理事情。我相信這是為什麼大部分的專家都是虛偽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倫敦政經學院無法把它所定下的原則（principles）套用到它自己身上的因素。

他們這樣對嗎？大學是否應該用規定而不是原則來管理？大學真的和其他職場不同嗎？我們在下一章會處理這個問題。

我上了一課

政府系決定不再要求我關掉部落格，而是改用抹黑的方式逼我。他們顯然準備好一套整我的方式。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指出，政府系的主任認為我已經瘋了，關於我精神錯亂的謠言也開始流傳。有一段時間，系裡以評分不公為由禁止我批改成績。學校人資部門派了一個女職員來盤查我很久以前動過的手術。有一天還有個傢伙騎著摩托車送來一份密函，信裡說要我請病假留職停薪。不用說，我拒絕了。我的確很生氣，但我還不到發瘋的地步。

我一位課堂助教告訴我一件事：

你或許有興趣知道我最近收到一封系裡給我的電子郵件，他們要求我回報你如何指導我上大學部的課（譬如我們多久碰一次面，你是否監視我等等...）。我不知道這是一個正常的程序還是他們想要恐嚇你的方式，但我肯定我所回報的每一件事都不會傷害到你。

有一天，一封電子郵件寄到我的信箱，這封寄給系上每一個人的信詳細描述我一年前如何讓一批大學部學生的情緒低落，以及我怠忽教師與導師的職守。他們還找來一個不爽的博士生，進一步提出不利於我的證據。因此，學校馬上會展開調查、處理並召開公聽會。

這是典型的激將法，他們做得相當粗糙，但我並沒有好好回應。最後，我並不是勇敢地站出來為人民的自由而戰，而是縮在家裡的棉被裡。他們愈恐嚇我，我就愈畏縮，

也愈來愈害怕。四月中開始，我不再到學校去。五月中之後，我不再看電子郵件。事情發展到最後，我因為過於不安甚至無法和我的朋友及支持者保持聯繫。我把面談時間（Office Hours）的地點移到星巴克，並在每天一大早偷偷溜進我的辦公室拿信。我睡眠不足，也可能是喝太多了。

情況當然對我不利。對於一個已經取得終生教職的老師來說，學校不可能把我開除，但他們可以用各種方法整我讓我受不了。2006年夏天，倫敦政經學院暑期班（Summer School）把我開除，我在那邊工作了八年。我可以從暑期班賺到我很需要的外快，在那邊教書也很有趣。但是，這份差事並非我固定合約的一部份，當我的部落格成為全國新聞的焦點，他們也不再邀請我到那邊教書。

2006年秋天，我開始一個計畫很久的休假。2007年2月1日我正式從倫敦政經學院辭職，[辭職信這樣寫](#)：

我決定辭去在倫敦政經學院政府系資深講師的工作。言論自由對於學術研究相當重要，對我個人而言也是如此，我再也無法在一個不願保護與分享言論自由價值的學術機構工作。³

離開倫敦政經學院之後我在台灣的一所大學教書。沒錯，我或許從地圖上消失了。但是，英國與倫敦政經學院在東亞人民的心中並不重要。新竹的國立交通大學是一所擁有傑出師資與優秀學生的世界級大學。我當然把太太與小孩都帶來了，我們現在很享受這裡的生活，爬台灣的高山、喝珍珠奶茶，還有學中文。

最棒的是新的老闆根本不管我在部落格寫些什麼。交大不以營利為目的，他們不用擔心招生的問題。他們認為大學教授應該有權決定自己要說什麼，不論是在課堂上或網路上。整體而言，台灣從1980年代引進民主，新興的民主足以讓島上的人民認真看待民主的價值，身邊有許多人對於前人冒著生命危險捍衛言論自由的記憶猶新。是的！我仍然還在寫部落格，但已經不再寫關於倫敦政經學院或英國學術界的事。還有更多有趣的主題值得我留下紀錄。

過去一年來我的部落格的訪客總共是 97,467 人，其中大約有 12,543 人讀過我的招生日演說。

³ 譯按：英文版並無這封信的內容經譯者與作者討論之後決定加入。